

净寺悠长的钟声背后,有他默默的守护 民警“董大”: 年复一年,守到最后个人离开



民警「董大」(左)

2017年12月31日晚上8点不到,杭州南山路延续了一天的热闹丝毫没有消减,人反而越来越多。

悠扬的钟声已经开始往外传。净寺门口,是等着排队买票进寺的人群,进了大门以后,大家涌向钟楼入口。

当晚8点刚过,已经排了几百号人。

民警董永军站在净寺钟楼前,一如这十几年的每一个跨年夜一样。他知道,再过两个小时,来这里祈福敲钟的人会越来越多。

董永军,杭州西湖景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,出生于1967年,50岁了,同事们喜欢称他“董大”。

他参加过各种安保工作,晚上这样的场合可以说是“驾轻就熟”。不过作为钟楼这个执勤点的负责人,他还是再次把安保要求做了强调。

连续十几年守护在净寺钟楼处,和前来祈福敲钟的市民一起敲钟跨年,已经成了他们这个团队每年跨年的保留节目。“简单的工作重复做,重复的工作认真做。”董永军说,年年守着净寺的新年钟声敲响,最后再看着市民平安回家,也是蛮有成就感的。

前来敲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
78岁的朱奶奶,每年的今天都会来净寺敲钟,敲响新年的祝福。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。她说2018年的主题是“新时代,新气象”。除了祈祷家人身体健康,朱奶奶还要祈祷国泰民安,“大家平安,小家才会幸福。”

晚上十点左右,队伍越来越长。

队伍中,有不少是一家子在排队,也有结伴前来的同学档。“刚从西湖音乐喷泉那边过来,敲完钟,然后去吃个火锅,2017年就圆满结束了。”王同学说。

董永军在钟楼出口处,引导敲完钟祈完福的市民游客有序离开。

从警二十多年,董永军先后从事过刑侦、经侦、禁毒、治安、特警等多个警种,他获得的荣誉很多,“最美杭州人”、“个人二等功”等等。

他说,每一份荣誉都是很多战友一起努力的结果。

在董永军眼里,跨年值班,只是很平常的一件事。“别人放假,我们总是在值班,不光是我,所有警察都这样,家人们也已经很习惯了。”

不过老家的父亲母亲,还是让他牵挂,“老人家很盼望(回家团圆)。”

他曾用漫画画下过父母的不舍,“每次我要离家回杭时,年迈的父母总是站在车旁,车一直开了很远,老父母却依然站在那,一直目送我的车子远去。”

南屏晚钟已经不停歇地敲了很久,敲了很多年,“你家人会到净寺和你一起跨年吗?”

我问董永军。

“没有,一次也没来过,怕干扰我工作吧。等我退休了,就可以作为普通市民,前来敲钟祈福了。”

凌晨,祈福的人群开始渐渐散去,冬日的清冷侵入骨髓。董永军和他的同事们等最后一位市民安全离开,就要赶紧回单位“眯一会”。

他们当中的很多人,来不及回家,即将开始新年第一天的值班。 本报记者 黄伟芬 文/摄 通讯员 张丹

飞机安全起降,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 机场空管塔台管制员瞿磊: 每刻都伴随无法形容的责任



萧山机场空管塔台管制员

2017
升级

20

今晚谁在为你守护

和一些影视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同,夜晚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空管塔台上并非一派灯火通明、人声喧嚣的景象。为了防止眩光和倒影影响观测,这里的灯光被刻意调暗。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圆形区域,各种工作席位沿着窗户一字排开,管制员们戴着耳麦,紧盯着眼前的设备。虽然管制员与航班机组通话,声音并不嘈杂。

这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晚上,58岁的瞿磊和他“热力金鹰组”的同事们,将在塔台这离地88米、四面玻璃包裹的圆屋子里,迎来2018年。

有些出人意料的是,他们都很年轻,最小的出生于1990年,瞿磊已经是其中最年长的了。

2008年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交通运输专业毕业后,瞿磊应聘到民航浙江空管分局,在机场空管塔台管制员岗位上已经干了快十年了。

在这个不大的天地里,像这样的跨年夜,瞿磊已经经历三四次了,除夕夜也一样。

“我们是做一休二的,所以工作十年,三分之一的概率跨年,算起来也差不多。”瞿磊笑着说。塔台管制员分成若干个大组,每个大组13人,一组一天,值班时分成两班,每三小时轮换。一个工作日短则14小时,最长的要上满24小时。

2017年12月31日0时~18时,萧山机场共起降航班429架次。“今天算少的,多的时候肯定过500了。”瞿磊说,忙的时候,两三个小时内就要放行七八十架飞机。

塔台里的岗位,分为塔台监控席、放行席、流量管理席、通报协调席等等。

监控席负责为机场管制地带内的航班提供空中交管,放行席负责向离场航班发布放行许可,流量管理席的管制员则需要随时关注限制变化、核实时间、记录相关飞机移交时间等。

没有人能单独指挥一架飞机起飞或着陆,飞机从推离停机位到最后离开机场空域,或是相反过程,背后都是管制员之间默契的配合、畅通无误的交接、一丝不苟的合作。缺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,机场都无法正常运行。

瞿磊是这天的带班主任,需要同时对各个席位的运行情况保持关注,并对任何突发状况进行协调处理。

事实上,塔台负责的是机场区域内0-600米高度上、以及在地面滑行的飞机,而更大范围内600-6000米高度上的航班,则由在一间挨着高塔但没有窗户的工作室里的进近管制员们负责。两个部门的配合与默契显得格外重要,一架飞机的顺利起降,上百人的安危不仅系于飞行员的操纵杆,也系于管制员们手中小小的话筒。

送走了2017年的最后一架航班,瞿磊和同事们相视一笑,互道了一声“新年好”,大伙随即又立即转向了各自的工作席。

对他们来说,跨年夜只是无数普通的夜晚之一,伴随着难以形容的责任。

当他离开这88米的高塔时,会看到飞机在翱翔,伴着远方2018年的朝阳。

本报记者 何晟
通讯员 胡伟泉/文 李翔/摄